第 1 章

全球經濟、後福特主義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政策

Timothy J. McKeown

至今，人們普遍同意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商品與勞動市場，特別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比過去更緊密地與全球經濟連結在一起，並且受到全球經濟更深切的影響。若以最簡單的方式衡量開放程度，就是以進口總值與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來衡量，一般而言，一九七〇年代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開放程度，遠比一九一四年的程度高；從當時開始，世界貿易成長就如同世界所得增長，皆呈現出兩倍的增長，而製造業的貿易在比例上更是呈現三倍的成長(McKeown, 1991; GATT, 1993)❶。對已開發國家而言，這種改變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在歷史上這些國家大量輸出製成品。以海運財貨的價值來計算，一九九二年製造業就佔了百分之七十三的國際貿易(GATT, 1993: 2)。雖然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油價的崩跌，部份證明了上述統計數據，但是二次世界大戰後一連串降低多邊關稅的協議(集中在降低製造業的關稅)，亦帶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❶：明顯地，因為除了有意識的政策選擇會改變衡量標準外，衡量的標準對要素優勢(factor endowment)與可進口產品的需求模式是很敏感的，所以藉由進口總值與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來衡量開放性是有問題的。然而，焦點集中在比例變動的討論較不易招致此種批評，這只是因為重要的經濟特徵不可能如同政策一般，發生幾乎一樣快速的變遷。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內部貿易額的上升(參見**表 1.1**)❷。

在本章中，我首先描繪出國際貿易體系的變化，乃針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所帶來的影響，其中將特別參考這項「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t)的意旨：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正在進化並擺脫「在裝配生產系統中，受制於大量勞工就業」的二十世紀中期的生產模式，而這個生產系統大體上是受到規模經濟的驅動。接下來我將討論次國家層級(subnational)與國家層級的變化，雖然和變遷的邏輯相比，兩者間的差別是值得關注且易於處理的重要主題。隨後我將呈現並討論當前經濟學家所做一些關於貿易體制與工資成長及分配的實證研究結果。這些實證研究提供了針對西歐、北美與日本等地區之貿易政策演變，對於共通性(commonality)進行檢驗時所需之重要背景。在制度上彼此分歧的國家中，研究共通性的範圍所代表的意義是：考慮到「彼此之間相近因素的優點」以及「全球經濟事務」這兩層面如何形塑這些國家的政策措施，而這樣的分析取向有其好處。結論這一小節的討論，強調開放貿易體系的多面向影響，並且提供了某些謹慎評估其影響的方法，以預測持續開放對嶄新政治回應的影響。

壹、開放程度日漸提升的經濟結果

一、次級國家層級的影響

我們認為隨著商品市場的開放會產生一些結果，一般說來

---

❷：貿易的增加不能歸因於運費或保險費用的降低。我們可以藉由比較「出口到 X 國的離岸價格」(f.o.b., free on board)與「X 國進口的到岸價格」(c.i.f., cost including insurance and freight)，概略衡量這些成本。我們針對一九五四年與一九九二進行上述比較，會得到「保險與運費成本」及「船運價值」之間的比例，分別是二點四與三點二(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79, 1993)。

表 1.1：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八九年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開放程度

	1960-1973	1974-1979	1980-1989
社會民主福利國家			
瑞典	45	58	63
挪威	82	89	82
丹麥	60	61	69
芬蘭	45	55	60
奧地利	53	66	75
平均值	**57.0**	**65.8**	**69.8**
基督教民主福利國家			
比利時	75	101	132
荷蘭	92	96	110
德國	39	51	61
法國	26	39	45
義大利	31	41	42
瑞士	61	66	73
平均值	**54.0**	**65.7**	**77.2**
自由福利國家			
加拿大	39	48	52
愛爾蘭	77	101	112
英國	41	55	53
美國	10	17	18
平均值	**41.8**	**55.3**	**58.8**
日本	20	26	28
澳大利亞	30	31	33
紐西蘭	46	55	63

資料來源：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various years).

，這些結果符合關於「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t)促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假定。的確，要將許多後福特主義的發展直溯至貿易體系的改變，表面上看起來是可行的。

在國際貿易的新古典主義理論中，黑克夏－歐林－薩繆爾森

理論(Hecksher-Ohlin-Samuelson)，斷言貿易的總值會跨越國界彌補生產要素的報酬。這項結論是以下列幾項假設為基礎：一致的科技、規模報酬遞減，以及差異不大的原始要素優勢(Helpman and Krugman, 1985: 13-16)。當這些假設遭到破壞時，現行理論則主張要素的報酬並非總能獲得補償，但是作為經驗法則(rule of thumb)的現行理論，儘管假設日漸開放的結果將會導致減少特定國家的要素回饋重要性，但此看法仍擲地有聲。此意味著，在勞動市場中，一旦控制了技術層級，在不同國家間的工資便趨向均等，其相同的論述也適用於利潤❸。在已開發國家中，因為非專業技能

❸：這樣的論述是從「國際資本市場的存在」，以及從「創造這樣一個市場以及使這樣一個市場自由化所產生的效果」抽象化而得來的。起初人們認為，資本市場自由化與資本的報酬是相當直截了當的：新的報酬率是在於「先前資本稀少經濟中的高報酬率」與「先前資本豐富經濟中的低報酬率」兩者的中間地帶(Gale, 1974; Karekan and Wallace, 1977)。在高度抽象層次上，我們可以建構國際經濟的普遍平衡模式，這個模式既與新古典主義的假設一致，也許馬克思主義的假設一致，而馬克思主義的假設利用遷徙與國際資本流動，以便在全球基礎上平衡邊際報酬(Roemer, 1983)。然而，從財金理論(主要是流動資產理論)中引入的議題顯著地改變了論述：當個體居住在一個受制於隨機干擾(stochastic disturbance)的經濟體系中時，以及當他們必須決定存下多少錢以及要在哪裡投資時，「資本市場整合便改變了相對要素報酬的類似決定要素，這些決定要素包括從存款利率，到為未來投資組合配置決定(portfolio allocation decision)奠定基礎的因素與其他要素；亦即從時間偏好率(rate of time preference)與風險趨避的層次(level of risk aversion)，到相關資產風險、全面生產力層次與平均相對人口(Osler, 1991: 89)」。接著，消費的不同時間偏好模式、不同層次的跨國經濟週期波動也會影響存款利率，而這種情況會導致不同層次的利潤變異；或是導致不同層次的風險趨避。其實，在資本市場自給自足的政策之下，規模相同的經濟體之間在資本存量(capital stocks)上的差異，只是不同存款利率的功能運作，而面臨不確定性的能動者，其未來投資組合配置決定也將隨著資本貿易，影響資本股票、淨生產量與因素價格。「因此，因素價格在許多不同面向上將(朝著資本市場的國際空隙)步步逼近。他們會彼此靠近，但是他們也會平行移動，不論上升還是下降；即使一開始這些因素價格是平等的，到後來也會產生歧異；最後也可以扭轉相對因素價格的位階，最低的因素價格會變成最高的，反之亦然。相對要素報酬所確實遵循的路徑，取決於『在一開始以及在消費者以儲蓄回應不確定變遷的過程中，這些國家是否有所差異，以及這些差異是如何產生的』(Osler, 1991: 89)」。

的勞工(unskilled labour)在全球整體經濟體中，比起在國家內部經濟體中還要多，而在國家內部經濟體中較為充裕的則是技術與資源，所以上述說法意味「開放會減少非專業技能勞工的薪資」，同時會拉高專業技能勞工(skilled labour)的薪資與資本的獲利。這會創造出一種情境：國際工資發生「趨同」(convergence)(這也是對於技術層級的控制)的當下，同時也發生了國家工資的「分歧」(divergence)(技術層級之間的歧異)；這種狀況影響了單一國家內，專業技能勞工與非專業技能勞工之間的政治統合，也使他們在貿易政策上的態度產生變化，而此種影響很容易推測出來。

一般說來，國際要素移動強調貿易開放對國內勞動市場的影響。伊希爾(Wilfred Ethier, 1986)延伸了李嘉圖(Ricardian)與黑克夏－歐林－薩繆爾森(heckscher-Ohlin-Samuelson)貿易架構，以適應一項特定要素的國際自由移動。一如我們所預料的，除了國際財貨移動之外，當發生國際要素移動時，國內要素回饋便容易達到均等狀態，由海普曼(Helpman)與克魯曼(Krugman)所提到的符合要素(qualifying factors)，不再能避免不同國內市場的要素回饋均等化。當然，在完全缺乏貿易自由化的情況下，如果不存在任何移民障礙，那麼國內勞動市場回饋便不需要任何貿易自由化，即能自行達到均等。由於針對專業技能勞工所設下的移民障礙，遠比針對非專業技能勞工所設下的障礙少，所以他們傾向於強調「擴

從她的實證結果與奧斯勒的模式來看，很明顯地只要奧斯勒所提到的某種重要國家差異繼續存在，漸增的開放性便不必然會產生資本市場匯聚的結果。而如果就要素報酬而言「會發生任何事」，那麼同樣地，就如同行動者對這些變遷中的要素報酬作出政治性回應一樣，「任何事都能發生」。當然，「許多股票的組合都宣稱他們擁有在空間上相當分歧的資產組合」這樣的事實進一步讓實證的情境複雜化：他們購買了在許多不同國家生產產品的多國公司股份，而這些公司的表現並未與任一國家市場產生緊密的連結，這意指甚至連奧斯勒的模式(在其模式中，資本永遠是「純粹的」國家資本)都只是一種簡化的說法。最後，我們應該注意到，在奧斯勒的模式中，如同開放所造成的福利結果會對資本市場自給自足政策形成柏瑞圖優越(Pareto-superior，譯者按：在改善一人處境的情況下，無損於另一人的處境)一般，這種結果也很容易就形成柏瑞圖劣勢(Pareto-inferior)：每個人會輸，或者會贏。

大此二團體的貿易開放」這種措施在效果上的懸殊。

隨著專業技能勞工與非專業技能勞工兩者在相對財富上的變化，商品市場的漸趨開放，也改變了每個國家內部經濟活動的混和形式。進口競爭(import-competing)的部門緊縮，出口部門卻在擴張，且涉及國際性經濟的經濟活動比例亦逐漸提升(例如：貿易財部門增加，其重要性可與非貿易財部門相比)。由於各部門通常與特定的地理區域有密切的關連性(Cassing, McKeown and Ochs, 1986)，或與特定的政黨有關(Kurth, 1979)，由於勞工團體的力量可能集中在逐漸進步的部門或正在走下坡的任一部門上，因此開放度的增加可以帶來相當長遠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也是在既有一般理論的限制下，以及未具有特定國家之知識前，極難預測的影響。

第三項存在於國際貿易與「後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之間的聯繫關係，在於貿易體系的變遷對生產本質產生的影響。一個較為開放的貿易體系，意味著出口商面對一個向外移動的產業需求曲線：國內市場越小，國際貿易開放的程度越大，而移動的幅度也就越大。此一發展又意味著實際上，需求達到飽和前，長期生產的趨勢便已可能實現了，所以大量生產的可能性已經增加。人們長久以來認為，倘若一個產業有顯著的固定成本，其獲利率取決於生產過程的長度〔或者說，產能利用率(capacity utilization)通常也是如此〕。因此莫蘭(Moran, 1973)主張，具有高固定成本且在一個特徵為顯著技術變化的環境中運作的公司，將成為一種政策的自然而然的支持者：創造一個開放的世界貿易體系。

同一時間，因為進口競爭導向的公司必須爭取更多的國內需求來滿足進口市場，所以他們較無法維持長期的生產運作或是工廠內部較高層次的產能利用，而這些工廠原先的規模是為了服務國內市場，也不存在著外來的競爭；除非國內市場可以相當快速地成長，以致於漸增的進口量與高度的國內消費兩者可以同時提高(當然，這是一種純屬理想的偶發狀態，而這種理想在近代比在一九六〇年代要更不實際)。如果進口競爭的廠商沒有退出市場，

且在生產成本上也無法與國外生產者相匹敵，那麼這些公司將可能大幅改變其生產技術，或是企圖將自身的產品差異化。前者意味著他們將以資本取代勞力，後者則意味著他們變成具有「利基」(niche)的生產者，以尋求在特殊產品的市場中生存下來，同時將大眾商品市場的主宰權拱手讓給進口商。當地市場的知識(特別是快速取得關於品味改變的知識)，以及一套既存有效的分配體系，對一個利基生產者而言，可能比起一個以外國大眾市場為主的生產者，更具有珍貴的比較利益(Gereffi and Wyman, 1991)。所謂專業彈性化(flexible-specialized, flex-spec)的生產也因此成為回應進口競爭的方式之一。

開放度漸增對大量生產所造成的第二項影響，正好與需求漸增的造成的影響相反。由於現在市場較大，所以便可能將研發的成本攤銷在每個銷售的單位上；而這種狀況會刺激研發的投資，以減少研發過程的時間間隔。因此產品的生命週期〔以維農(Vernon, 1966)著作中的意義為主〕就變得更短了〔在葛羅斯曼與海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 1990)的著作中，發展這項直觀知識，並使其形式化〕。當然，此一發展也意味著，因為可用的時間量(在這段時間中，要從既定的產品與過程來獲得規模經濟)正在萎縮，所以針對機器與人力所進行的投資，相對上更具有吸引力，而這樣的投資具有多重目的，不會為了範圍相對狹窄的生產可能性發揮最大效益。對於在國內高度集中的產業而言，將產品市場開放給進口商可能會促進競爭，反過來則將阻止寡頭產業相互勾結以阻礙產品或製程技術的改變，例如汽車產業即是(只要對過去三十年來底特律汽車產業的行為略加觀察，即可發現此種行為的端倪)。另外，此也對專業彈性化具有正面的意涵。

最後，組裝線上的就業率降低，不必然意指組裝線本身的消失與所造成的勞工消失。這與短期的貿易開放度增加沒有密切關聯的改變(如生產者產品的價格降低，特別是那些具有估算能力的財貨；以及專業技能勞力供給的提升)，在任何情況下都可能帶來

這種結果。技術上的改變也可能對勞力產生非常不相同的影響，特別是對那些技術組合相當狹隘且變化少者猶然。舉例來說，在美國，電腦產業中自詡為成長最快速的職業，乃是電腦工程師。但消退最快的一個行業，也是電腦操作員(Bureau of the Census, 1996: 409)。這樣的發展會扼殺勞工組成一個聯盟的能力，即使是在一個單一的產業中亦然。

二、廣泛經濟層面的影響

貿易開放度或貿易模式的改變，除了會對特定部門或社會團體產生影響外，還會產生廣泛經濟層面(economy-wide)的變化。最晚從凱因斯(Keynes)時期以降，人們承認在勞工或儀器閒置不用的情況下，當外國政府沒有提出要求補償行動時，增加出口或減少進口是一個提高產出與收入的簡易方式(即使我們可以預期會產生抵銷的反應，但是針對閒置不用的勞工或儀器提供一定時期的保護，其政治利益仍然可能大於充分利用資源所可能產生的利益(Cassing, MaKeown and Ochs, 1986; Wallerstein, 1987)。在任何傳統國際經濟學教科書中皆可找到這樣的古老洞見：在資源不足的時期提供保護，將會造成資源的錯誤分配，因而降低福利。若將之放在一起思考，這些洞見都認為商業政策可以扮演一種反循環(countercyclic)的角色；歷史上的各種保護組織則沮喪地認為，政府已經利用這項可能性。最後，改變保護的程度造成成本的調整，且因為代理人只擁有少樣或不健全的多樣化的資產組合(特別是不可逆的技術投資)，因此其通常經歷大幅的獲利或虧損。

除了這些基本的觀察外，還有其他一連串的總體經濟考量。要公平地處理這個議題，必須偏離原軌，進入開放總體經濟理論，不過還是有一些有用的議題可以討論。

貿易不平衡的存在引起了其中一項議題。只要國際資金流動不息，維持進出口平衡的短期收支平衡壓力便相當的虛弱：在資

本帳戶存有盈餘的情況下(因為向國外借款或是從之前國外投資的進帳)，國家可以在流通帳戶(current account)上以擴張借款期限的方式形成赤字。同樣的，如果將收入在海外投資，以便產生能與流通帳戶向內流動相配合的資本向外流動，那麼出口大於進口所產生的盈餘也可以維持一段長時間(如果這個流動達到了平衡，國外匯率的價格就會是穩定的)。雖然長期的貿易赤字會與成長緩慢及失業率產生關聯〔如同兩次戰爭間的英國(參見 Cairncross and Eichengreen, 1983)〕，仍可將其視為一個經濟體資本主義「正常」的發展過程，其一方面可創造較低的資本水平(因而吸引新的海外資金)，另一方面則可接收實質的國外投資收入。反過來說，長期的貿易赤字也可與正常水準以上的所得成長率連在一起，如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九〇年間的日本，但其亦可能與長期的債務償還、以及不亮眼的績效成長產生關連，例如最近幾年來的拉丁美洲。

因為限制貿易或使其自由化都會影響到外部的平衡(透過其對流通帳戶產生立即的影響，並衍伸出對資本流動或匯率產生的影響)或內部的平衡(透過其在國內勞動市場中所產生的就業或無法就業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擴大討論傳統有關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抵換(trade-off)關係，並納入商業政策，當成另一種額外的工具。馬基、布洛克與楊格(Magee, Brock, and Young, 1989)已更進一步發展這個想法，他們調查了美國經濟保護程度的演進，並提出一個兼具理論與實務意涵的結論，主張保護的程度，部分取決於財政與貨幣政策所作出的決策。雖然提高保護或不降低保護則比較能夠與之協調，但是降低保護是一種對抗通膨效應的方式(因此，如同前述，我們可以祭出提高保護來對抗失業率，同時不改變保護的程度則是一種妥協的手段)。如果消費者只購買可貿易的財貨，則貿易必須有足夠的開放程度以使得這些財貨的價格趨近於全球市場的價格，接著只有當國內貨幣貶值的情況下，國內財貨的價格水平才會增加。

貿易除了對配置效率形成單次的影響外，最近的研究也將一

些國際貿易效果併入成長模型中，並認為貿易自由化會帶來高度成長時期的擴張。我們可以將前面所提到的案例，視為一個普遍現象(貿易政策能夠改變投資額與投資報酬率)的特殊案例，而在此案例中，貿易自由化縮短了科技密集產業中的產品週期。假如一開始便提高了資本報酬率(一如在資本充裕的國家中)，那麼儲蓄的增加，則會引起資本存量快速成長，遠比其他情況更快速。要正式展現此種狀況，必須要有一個模型，而在此模型中，資本存量是內生地(endogenously)決定，而非作為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公式中所假定的外生(exogenous)變數(Stolper-Samuelson, 1941)。此模型的一個可能的結果是，貿易自由化對要素報酬率沒有長期的影響，這所代表的意義是：自由化的影響是由要素與產量在量上的改變，而非價格(Baldwin, 1992)。

不幸的是，對資本充足的國家而言，在考量到這些新投資的地點(location)時下，此一模型相對樂觀的意涵便有所保留。在全球經濟體(在這樣一個經濟體中，並不存在著金融工具，因此也不存有金融與「實質」變數的區別)投資地點的簡單模型中，盧卡斯(Lucas, 1990)注意到，簡單的投資報酬率考量會引起資本從資本富裕國流向資本稀少國，他也注意到甚至在近代，資本流動可觀察的規模太小，以致於可能無法與資本貧乏國家的生產力劣勢一致。在低度開發世界中，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越來越普遍，盧卡斯面對這個問題(在資本貧乏的國家內，國內資本家為外國資金進入設下障礙)的解答顯得越來越脫離歷史脈絡。如投資報酬率的顯著差異不變，同時在低度開發國家中，投資的障礙也已移除，且貿易體系已然開放，以致於資本貧乏國家能夠接觸製造商品的市場，那麼將製造業中的投資吸引往資本富裕國家的唯一力量就是已開發世界較低的風險(例如：較低的報酬率變動風險)，而會產生這種現象，也可能是因為已開發國家中存在著規模報酬遞增的產業，而這種產業享有所謂「先行者」(first mover)的好處，因為這些國家內存在著「特定地點」的資產(place-specific assets)。除了

天然資源與基礎設施外，此種資產最明顯的就是人力資源的原始優勢。對於一個「靠租金生存」(rentier)的社會，哈柏森(Hobson, 1965 [1938]: 364-365)認為，似乎不再完全不可能(雖然他似乎並未忽略「先進國家降低工資的壓力以及在新興工業國家中提升出口的壓力，能夠緩和、抑制甚至扭轉這個過程」這個事實)，他認為在這樣的社會中，為了有利於勞務活動，都會區的工業與農業遭到的消滅。哈柏森特別凸顯中國在此一過程中的重要性，如今看來相當具有預測性：台灣與中國佔了全世界出口的百分之九點一，且中國出口每年都成長大約百分之二十。這不僅是一個比其他領先出口國還要高的成長率(GATT, 1993:3, 4)❹，因為低工資人口佔中國人口極大比例，這更意味著中國想讓出口達到穩定，其所需花費的時間會比日本或亞洲四小龍(南韓、台灣、香港與新加坡)要長得多。後面提到的這些國家，現在其出口成長率與全球平均水準相差不遠；的確，有些歐洲邊緣國，現正經歷遠高於全球水準的出口成長率(參見**表 1.2**)。然而，已開發國家的保護障礙、或是中國本身的劇變，都讓人質疑這些國家的出口成長數字是否只為曇花一現❺。

依循此脈絡，新自由派強調基礎設施(如「資訊高速公路」)、教育、以及再訓練，其作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錦囊妙計，這是不言而喻的觀點；如果我們假設，開放貿易與投資模式將會繼續存

---

❹：這是針對一九九二年的狀況進行計算，並且將歐盟內部的貿易排除於世界貿易之外。有人認為所有香港的商品再出口(reexport)，都是來自中國，這也不盡真確。若將歐盟內部的貿易囊括進來，則中國的占有率會降至百分之六點九，而中國會成為第四大出口國，僅次於美國、德國與日本之後。

❺：如果考量到勞務的交易，則某種程度會上會調整這樣的圖像。勞務的交易快速成長，其速度幾乎是製造業產品貿易的兩倍，而美國、西歐與日本持續居於主導地位(世界上大部份的勞務出口，都是來自這七個已開發國家：美國、法國、義大利、德國、英國、日本與西班牙)。有趣的是，在勞務出口方面，義大利與西班牙正經歷最快速的成長。美洲的邊緣國家在勞務出口所佔的比例，顯然比在製造業出口所佔的比例更顯著：美國的勞務出口超過法國百分之六十以上(GATT, 1993: 5)。因此，美洲在尋求移除勞務出口的貿易障礙上會這麼積極，也就可以理解了。

表 1.2：一九九二年一些國家的製造業出口成長率與佔有率，出口值以百萬美元為計算單位

國家	出口值	占有率(%)	成長率(%)
美國	448.2	12	6.3
德國	430.0	11	6.8
日本	339.9	9.1	8.0
義大利	178.2	4.8	5.1
香港			
出口	119.5	3.2	1.8
再出口	89.4	2.4	29.6
中國	85.0	2.3	18.2
臺灣	81.5	2.2	7.0
南韓	76.6	2.1	6.6
新加坡	40.8	1.1	5.9
瑞典	56.1	1.5	1.6
墨西哥	46.2	1.2	7.7
奧地利	44.4	1.2	8.0
馬來西亞	40.6	1.1	18.3
丹麥	39.6	1.1	10.1
俄羅斯	37.0	1.0	未計算
巴西	36.1	1.0	14.2
挪威	35.2	0.9	3.1
泰國	32.5	0.9	14.2
愛爾蘭	28.3	0.8	16.9
葡萄牙	18.3	0.5	12.4
土耳其	14.7	0.4	7.9
世界平均			**6.3**

資料來源：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93).

在，那麼這些新自由派的強調，顯然就是避免使工資與薪資被進一步被壓低的策略。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或許仍保有其低政治風險上的優勢，但藉由更完全地開放國內經濟體，已面臨全球經濟中的紛紛擾擾，這種移除保護的措施應該會增加自由化國家「特定國家資產」(nation-specific assets)報酬率的變異性，特別是那些

有投入貿易財貨生產的國家。當然，同一時間徵收與其他強制取走物品的作法，在較低度開發國家已經不復存在，因此對其投資地點可觀察到的風險，也很可能會隨之降低。

貳、全球化開放度日益提升下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經驗

經濟學家已經開始爭論減少貿易障礙對成長與所得分配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美國，此一爭議因為公眾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關注而如火如荼地展開；許多經濟學家已經嘗試陳述「美國過去二十多年來，在歷史上真實工資成長的失敗表現」與「國際貿易體系的改變」之間的關係(Leamer, 1992; Murphy and Welch, 1991, 1992; Bound and Johnson, 1992; Lawrence and Slaughter, 1993)。然而對於此二者間的關係究係為何，目前尚未形成一個共識。雖然有些人，如李默(Leamer)、莫非(Murphy)與威爾曲(Welch)所主張，貿易型態的改變與工資間具有關連性，但另外一些人，最著名的勞倫斯(Lawrence)與斯洛特(Slaughter)則爭辯道，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美國境內的貿易改變與所得的分佈之間具有任何關聯。

第二個調查的領域將焦點集中在國際收斂的程度與速度上。在有些人針對此主題進行直接研究的同時，另一個同樣可信的選擇，則是在一個高度整合的單一貿易體系中，研究區域的收斂現象。這項選擇隱約認為，藉由建立收斂在最佳情境中發生的速度，我們最少在「與經濟及政治關係並未緊密連結」的領域中，發展一個估計經濟收斂速度的上限。巴羅與薩拉馬汀(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1)針對一八八〇年到一九八八年，美國五十個州之間的收斂進行研究，同時也針對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五年，西

德、英國、義大利、法國、荷蘭、比利時與丹麥的七十三個「區域」(省)之間的收斂進行研究，他們發現在這兩個案例中，區域間的差異漸漸地以每年約百分之二的差異度漸形萎縮。威廉森(Williamson, 1992)所提出關於在十四個類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❻的國家中，非專業技能勞工的實質工資資料，顯示了在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九〇年，以及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四年之間，發生了明顯的收斂現象，但是在其他階段則發生的收斂現象就不怎麼顯著，甚至發生了發散的現象(包括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威廉森針對「在歐洲共同體的國家中，貿易自由化對工資收斂產生影響」所提出的證據，發現即使在「歐洲共同體內部存在著進行遷移的實質障礙」這樣的時期中，收斂的速度還是可以與美國不同州之間的收斂速度相比擬。因為在美國與西歐的案例中，遷移與資本流動對要素報酬均等化的影響，或許只是強調了因為商品市場整合而發生的收斂，所以我們認為「在『資本與勞務流動的阻礙持續存在』的國家間所發生的收斂現象，將會更加緩慢」這樣的說法似乎很安全。

近來成長理論的發展也暗示了國家間的差異若是實質的差異，那麼開放也不必然會產生收斂。這種狀況會發生在下面情境中：不同類型的國家會延著不同的成長路徑前進，不同種類國家之間的相互連結不足以讓國家從一種成長路徑移往另一種路徑，而不同類型的財貨或要素的流動提供了這種相互連結。德洛福與強森(Durlauf and Johnson, 1992)分析國家中具有相同初始收入(initial income)與識字率的次團體(以一九八八年的資料為基礎)，並且產生了一個與「在樣本國家中，存有一些均衡成長率」這樣的假設一致的統計結果。因此，當系統開放時，類似的國家會產生收斂現象，但是全球性的收斂卻不必然會發生。這是另一個解釋

---

❻：無疑地，因為資料有效性的問題，唯一包含在十四個國家中的低度開發國家是阿根廷。阿根廷對於一八七〇年的工資衰退顯然像個局外人一般，而這不利於隨後一百一十八年的實質工資成長(參見 Williamson, 1992: figure 2)，而阿根廷顯然也不瞭解實質工資與人口成長之間的關係。

以下現象的理由:「為什麼當一個人歸納已開發世界內部的收斂現象，並運用在開發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之間的收斂時，應該稍作遲疑」。的確，因為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平均每人所得(per capita income)在全球基礎上的分散現象正在增加，同時貿易體系也漸漸變得更開放，所以任何「在不考慮國內或國家間過程的情況下，就將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factor price equilibrium theorem)運用在歷史情境中」的模式，都會因為太過不精確而無法使用。

勞倫斯與斯洛特的著作(Lawrence and Slaughter, 1993)提供了一個更為懷疑的論述立場，他們認為沒有證據，能夠將貿易漸趨開放與美國非專業技能勞工的實質工資下降這兩者關係連結。他們的經驗分析是多層次且複雜的，但是基本上他們的論證是取決於財貨價格(與貿易措施)缺乏變遷，而新古典理論認為這種現象是一種貿易體系變遷影響要素報酬的機制。他們認為低工資成長的原因在於邊際實物生產力(marginal physical productivity)的成長率過低，而他們也特別指出作為眾矢之的的美國服務業(通常是指非交易性的財貨製造商)，其生產力成長過於緩慢。

因為他們過度依賴新古典理論(特別是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的分析機制，所以他們的論述最終是不足的。這個理論的本身是為了「國家資本」的領域而設計的，在此領域中，財貨生產發生在單一國家內(而不是討論涉及數個國家的生產過程)，而此領域也不處理國際資本流動的問題。在後一九四五年的時代中，美國公司在外資中是最活躍的，這種狀況與「美國在大部份的時期中，是屬於高薪資的經濟體」的現象是一致的。雖然在美國國內還保有非生產(nonproduction)活動，但是解除製造業的財貨生產過程，以致於許多實物生產能夠在海外廉價工資的經濟體中進行，這樣的措施造成了下面結果：

1. 在美國產業中，非生產勞工與生產勞工兩者的比例有所增長。
2. 雖然非生產傾向映射於「專業技能」的一方，但是因為「生

產」傾向映射於「非專業技能」或「半專業技能」的一方，所以製造業對於專業技能的勞工(這是相對於較不嫻熟技術的勞工)的需求也就產生了實質的增加。

3. 因為許多實物生產的過程是在海外進行，所以在此過程中，為了增加邊際實物的勞動生產力而付出的資本投資，也是發生在海外。因此，美國製造業的邊際實物生產力(也就是說，在美國地區範圍內的製造業，卻不是由「美國」的公司來進行生產)也就無法如同先前一般成長快速。
4. 緩慢的生產力成長預告著緩慢的工資成長。然而，如果是從「工資能購買多少製造業財貨」來衡量工資(勞倫斯與斯洛特以此法進行測量)，那麼因為製造業勞工能夠以其工資，購買比以前更多的產品，所以工資似乎是成長快速。然而，這些財貨的成本降低是由於全球化的關係，全球化因為降低的生產成本，以致於從事製造該類財貨的公司能夠壓抑財貨價格的上漲、增加花費在非生產勞工的支出，並且仍然能保持獲利。因為美國進口增加的半成品仍然是屬於低成本、低附加價值的財貨，而出口增加的成品仍然是高附加價值的財貨，所以美國並未改變其貿易方式。
5. 非專業技能的勞工從國內製造業中釋放出來，壓低它國非專業技能勞工的工資。對於那些屬於第三部門的公司而言，轉變為從事「相對上更為偏向不需非專業技能勞工的勞力密集」的生產過程是極具吸引力的，而且較不依賴於改善先存勞力(preexisting labor force)的邊際實物生產。因此，美國服務部門的生產力成長不如歐洲顯著。
6. 在工資與生產力變遷的結果上與美國最為相近的歐洲國家，是英國；但是公司的全球化最為擴張，且持續時間最長的歐洲國家，也是英國。

如果這項分析是正確的，那麼對於先進資本國家中專業技能

與非專業技能的勞工而言，貿易漸趨開放對其地位所產生最重要的影響，即非透過商品財貨市場而操作的傳統要素價格均等化，而是對投資模式的影響，而此模式是由貿易體制所推衍出來的。雖然已開發國家的公司在低度開發國家中的外資，對於這些低度開發國家有所貢獻，但是這些外資既不足以也不必然產生上述效果〔在一九八〇年代，美國是基本的外資**接納者**(recipient)(Bhagwati, 1995: 46)〕。更為基本之處則在於本地或外國投資者，現在都能在一個廉價工資的經濟體中，投資勞力密集的製造業，而確定了下列的認知：出口到已開發世界的政治障礙已然大幅度移除。

芬斯查與漢森的著作已然探討了這項發展所帶來的實質影響(Feenstra and Hanson, 1996)，他們發現在美國，非生產勞工佔薪資總額的比例在外包(outsourcing)的程度上，是一種廣泛定義且逐漸增加的運作結果；然而，結果卻會隨著各種產業而有所不同。整體來說，外包現象的增加解釋了為何非生產勞工佔薪資總額的比例會增加百分之十五。

參、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自由化政治學

「對於如日本、西歐與北美這些具有一組不同貿易政策(與貿易史)的國家而言，我們可以將貿易自由化的概推於於每個國家」，這樣的觀念是相當有問題的；然而，仍然存有一些明顯的跨國相同處，這是我們應該指出來的。

首先，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傾向於共同增加保護或去除保護。在後一九四五年的時代中，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架構下所展開明確的多邊談判，對這種共同的變化產生重大的影響；然而，降低貿易障礙這種基本互惠本質，早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前幾個世紀即已出現〔例如，寇尼貝爾(Conybeare, 1986)指出貿易障礙「以

牙還牙」(tit-for-tat)的談判特質，可以溯源至十四世紀的漢薩(Hansa)聯盟〕。從政治的觀點看來，降低某一方的貿易障礙，幾乎就是向外國人讓步(因為生產者的利益幾乎總會戰勝最終消費者的利益)，而對該國而言，為了使降低貿易障礙在政治上確實可行，也必須確保外國人會做出相對應的讓步。

第二，先進資本國家彼此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比起先進資本國家和低度開發國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更快速也更徹底。會形成這種狀況有許多原因。直到最近，與低度開發國家展開貿易自由化所遭遇到最重要的政治障礙，即在於部份低度開發國家對於「同意採取雙方互利的讓步」感到興趣缺缺；因為低度開發國家雖然要求進入市場，卻普遍不同意這樣的讓步，所以已開發國家較無誘因與低度開發國家國家談判〔一般說來，諸如美國的一般優惠待遇(American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加勒比海盆地振興法(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以及歐洲亞溫迪與洛梅協定(European Yaounde and Lome conventions)等針對低度開發國家所採行的貿易優惠，都是這樣的設計，致使只有大都市的進口製造商能從這些優惠措施中獲得實質利益(Langhammer and Sapir, 1987)〕。即使低度開發國家願意做出雙方互惠的讓步，但也因為個別的市場規模過小，再加上在已開發國家中，存在著規模龐大、擁有政治實力，且能夠與低度開發國家的生產(例如絲織品、糖)直接競爭的部門，均致使協議的形成備感艱難。在商業學派意義中，歷史上低度開發國家出口的財貨均成為「商品」：這些商品所代表的不只是有差異性的財貨，其市場滲透經常取決於簡單的成本優勢，而不是取決於財貨的品質。當一家公司生產許多差異性財貨，可能做出「因為公司在本國的一條生產線上丟掉的生意，可以藉由在另外一個海外國家所得到的生意來彌補，所以他們可以容忍貿易更為開放」這種結論的同時，「商品」的生產者則不太可能會經歷這樣錯亂的結果：如果這些生產者(除了一些礦業與農業財貨，大部份是來自北美)身處於已開發

國家中，那麼他們會成為一個曖昧的輸家。因為要在已開發國家中補償輸家，存在著政治上、財政上與行政上的困難❼，所以他們努力抵抗自由化，並且常常能獲得成功。

對於南北半球相對缺乏互惠的障礙排除，有一個更為恰如其分的理由：北半球的重要利益確實是源自南半球長期以來的保護政策。在一九四〇年代到一九五〇年代這段期間，當北半球的保護主義力量變得很強大，足以抵抗任何低度開發國家商品進口的開放時，北方從低度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中獲得的商業利益，挑戰了進口替代工業化(import 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SI)，作為這些國家的次佳策略。對艾森豪(Eisenhower)政府而言，挑戰進口替代工業化在政治上成就了兩個世界的最佳狀態：南方國家的國內擴張能夠滿足國際導向的商業活動，同時南方國家缺乏出口活動，又能避免與進口競爭的部門發生衝突，而這些部門正是一九五〇年代共和黨的基礎。一但建立了進口替代工業化，國際導向的公司就既能藉由「提供生產者的財貨給這些經濟體中逐漸擴張的產業部門」而獲利，也能藉由「利用進口替代工業化所設下的障礙，直接在這些國家中進行投資，並且抽取由這些障礙所產生的租金」而獲利。隨著北半球的保護主義衰退，正如同美國在生

---

❼：因為如果贏家不需要支付額外紅利，那麼他們就不會想做此支付，且因為贏家難以隱藏額外紅利的真實內涵(對於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團體而言，額外紅利是一種賄賂，目的是希望能誘導人們接受表面上看起來對公眾有利，事實上則對團體較有價值的結果)，而以其他的形式來表現，所以要在已開發國家中補償輸家存在著政治上的困難。而具有財政上的困難則是因為具有問題的產業(特別是絲織品)相當的多；即使(就美國而言)貿易調適的協助並不是針對該產業，但是對於受影響社群的失業保險基金、社會安全與家庭維持基金以及稅收而言，該產業的失業狀態會產生嚴重的影響。因為這樣的產業在空間上是集中的，所以這樣的效果不夠分散，不足以讓整體經濟能夠漸漸吸收(並隱藏)這樣的效果。而其行政上的困難則是因為道德風險的問題(moral hazard problem)：正如調適協助的支持者長期以來所認知一般，這種計劃的存在阻止了即時的退出，而且人們也擁有「誇大進口對其財富帶來負面效應」的動機。「判定一個產業有多少的挫敗是由於進口所導致，以及判定有多少挫敗是由於其他因素所導致」，正是行政手段經常遭遇的困難，而這些行政手段是用來彌補那些因為進口而遭遇傷害。

產財貨上大幅喪失了相對的優勢，並且因為低度開發國家漸漸成為出口的據點，而不再只是服務國內市場，所以在進口替代工業化中，北半球的利益蒸發了❽。不幸的是，對低度開發國家而言，以不自然的方式維持的產業基礎(以及從此基礎所產生的政治力量)，無法如同從維持這些產業基礎中獲得的北方利益，一樣快速且輕易地消失。

另一個先進國家貿易政策的共同特徵，在於他們都會保護缺乏競爭相對優勢的重要選民區域，以及在於受到保護的區塊規模夠大，足以影響國家的選舉政治。在所有的三個區域中，我們可以在絲織品與農業中發現此種狀況最重大且顯著的例子。經濟學者喜歡指出下面這一點：在所有各種「使用公共政策來對抗進口所產生失業效果」的方法中〔補助受雇者、補助公司、關稅、拍賣配額、普通配額，以及自動出口限額(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VERs)〕，政府最常選擇最沒有效率的方法(自動出口限額與普通配額)，且幾乎從不選擇最有效的方法(亦即直接工資補助)。當然，因為執行這種無效政策措施所產生的外溢(spillover)現象越為廣泛，支持這項政策的聯盟規模也就越大，所以從政治的觀點來看，正是因為這些政策的無效率，才讓政府選擇這些政策，作為解決方案。這樣的政策讓先進國家之間貿易談判變得複雜，不只是因為這些政策阻礙了適應的行為，更因為改變或廢除這種政策所產生的國內政治影響是相當深遠的。或許，農會與日本自民黨是這種狀況最廣為人知的案例。自一九八〇年代起，因為美國官員重視自民黨的連續執政，其程度如同美國官員對於降低日本農業保護政策的重視，所以很支持大力抨擊日本以限制為目標的農業保護政策

第四項先進國家之間的共通性，即在於他們都藉由逐漸依賴

---

❽：在這裡，「北方」利益本質上等同於「美國」利益，而這是取決於美國從一九六〇年代晚期開始，在雙邊援助、各種援助共同體，以及多邊放款機構(multilateral lending institutions)中，所扮演的霸權角色。

非關稅壁壘(nontariff barriers, NTB)的方式，響應彼此針對排除關稅壁壘所進行的協商。採取此種措施具有兩個不同面向的政治意義。首先，未受規範的非關稅壁壘相對上是一種不顯著的替代方案，用以取代受到高度注目且明文禁止的關稅壁壘；再者，對於策略定位的進口競爭公司而言，非關稅壁壘會的選擇性裁定(selective awarding)會藉由施行行政手段並遊說政府的方式，個別誘導所有這類的公司尋求進口的鬆綁，而不會藉由採取形成聯盟並制定不同貿易法規的方式。

除了「和關稅相比，非關稅壁壘是擴大保護較無效率的手段」這個事實外，非關稅壁壘的定義是模糊的：正如同任何影響國產財貨價格或出口價格的公共政策措施一般，我們同樣也可以將其視為非關稅壁壘。因此，非關稅壁壘在貿易協商中的考量，無可避免地就是要將在各種領域中形成的國內政策國際化，這些國內政策包括研發的花費、競爭政策、勞力標準、職業安全健康與集體談判，以及環境與生產安全的規範。每個國家的生產者試圖利用諸如產品品質標準這種規範，來保護自己避免外國進口的衝擊，或者，他們也會試圖去承擔加諸在他們身上的規範負擔，諸如職業安全與健康標準，藉以自我擴張到整個交易領域。在歐洲「一九九二年」的提案與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中，以及在北美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中，此種現象的政治衝突已然展開。我們可以預測，在新世界貿易組織的烏拉圭回合談判(Uruguay Round)中，所創建用來檢視非關稅壁壘的這種機制，將進一步引發這種衝突。

第五，在三個已開發的國家區域中，有兩個已處於或正在移往區域的貿易安排中(雖然東亞內部(intra-east Asia)的出口漸漸佔了東亞國家整體出口總額的一大部份(Park, 1994)，但這是「東亞的收入成長比世界其他地方更為快速」的必然結果；對於其他的東亞國家而言，每一個東亞國家都是最好的出口市場)。這是歐洲貿易的長期特色，不論東歐或西歐皆然。對於西歐而言，他們顯

然佔有優勢，擁有與美國展開貿易協商的談判權力。對美國而言，區域性安排或「迷你多邊」(minilateral)的安排，代表了一九八〇年代之前政策的重大分裂。一般說來，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八一年，美國視區域貿易的安排為真正的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之外的一種次佳的另類選擇，而諸如拉丁美洲與西歐這些地區，部份為了政治上的(亦即非金錢的)理由會較為偏好區域貿易安排。隨著雷根政府的上任，美國政府開始與加勒比海盆地、以色列、加拿大與墨西哥協商優惠貿易安排；對於擴大北美自由貿易區域，以便囊括拉丁美洲，以展現其興趣所在。

對於區域安排敬而遠之的重要國家之一(日本)，也是大部份利益源自現存貿易體系的國家。有人認為，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是對「日本挑戰」作出的一種防衛性回應(Sandholtz and Zysman, 1989)；我們也可以用相同的角度來看待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然而，隨意的觀察行動暗示了這兩個區域的集合包含了各異的調適策略(coping strategy)。比較這兩個貿易領域優勢的差異：雖然西德與葡萄牙在國內每人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長期比例上，與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比例相似，但墨西哥的人口佔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總人口的比例，遠大於葡萄牙的人口在歐盟中的比例(即便將其他較為貧窮的歐洲國家人口加入，而葡萄牙佔有的比例圖像亦未發生大幅度改變)。因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美國勞力市場的影響力，應該比歐盟的擴張與深化對歐洲帶來的相對影響力來得大。

雖然某種程度上就「提供歐洲公司機會，使其能達成最適規模(optimal scale)」而言，一般認為歐盟是合理的，且歐盟多少也成為增加國家市場內競爭的手段❾，但是美國甚至早在一九八八年雙邊貿易協議之前，就已是一個大型的市場，並且與加拿大緊

---

❾：鮑德溫的著作已經注意到這種論述中潛在矛盾的本質(Richard Baldwin, 1990)：雖然「增加競爭」暗指藉由利用貿易政策以創造進入市場的功能性對等的方式，阻止產業的集中化，但是「最適規模」的論調暗示產業報酬的逐漸增加，因此也暗示了獲利的寡占。

密連結。因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與「美國公司的最適規模，或者是墨西哥的競爭為美國的製造業帶來的利益」較為無關，相較之下，在已知墨西哥從出口中獲利，能夠償付其債務的情況下，反而與「降低美國公司的勞力成本，並壓低美國消費者必須擔負食品與衣服的成本」較為有關。當然，對雇主而言，最後一點也是有趣的一點：正如同十九世紀英國的製造商支持廢止穀物法(Corn Law)，以便讓這些製造商只要支付其雇員一塊麵包，以及足夠其維持生計的低工資一樣，美國的雇主也從大眾產品的低貿易壁壘中獲利。

第六，所有已開發國家區域都擁有(或正在修正)其政治結構，這種狀況使得保護主義聯盟要捲土重來變得更加困難。我們可以將這些作為，視為「政治系統中一股國際導向力量想要『封鎖』漸趨開放的國家政策」的企圖。

1. 雖然企圖為此論點辯駁的現存理論(Rogowski, 1987; Magee, Brock, and Young, 1989: 98-99)不太能夠說服人，但是如同在西歐，擴大了貿易決策管轄權的地理規模，或許有利於自由貿易⑩。

---

⑩：布洛克、馬基與楊格認為，區域越大，生產者的利益越有可能主導消費者的利益。他們將此種論述的基礎建立在一個假設上：隨著區域的擴大，未經組織的消費者確實能產生**較少的**平均每人所得，以致於選舉時期的整體消費支出維持恆常不變的狀態。因為平均每人的生產支出不會降低，所以隨著區域的規模擴大，選舉活動的支出也會增加。

當我們解釋區域大小與自由貿易政策之間的假設關係時，隨之而來的麻煩即在於生產者就如同進口一般，很容易就成為出口競爭部門；那麼馬基、布洛克與楊格等人所提出的機制就會導致完全相反的結果。這些學者企圖藉由主張「在美國，由於進口競爭產業和出口產業相較之下『小』了許多，以致於可以將進口競爭產業比擬為消費者」，免除這種困境。除了缺乏關於公司規模大小與比較優勢的實證資料之外，他們也沒有考慮到「小型公司或許比大型公司更能完善組織成為貿易合夥組織(這比較可能出現在美國的情境中)」這種狀況的可能性。

羅高斯基(Rogowski)認為，大型區域的政治人物更能與社會壓力「隔離開來」，這主要是因為一般認為大型區域比小型區域囊括了更多的利益團體，

2. 改變立法程序致使貿易法案不再受制於發言修正(floor amendment)(這是一九七○年代美國採用所謂快速程序(fast-track procedure)的其中一部份)，阻絕了「接連利用一系列修正法案，脫離不同支持團體」的可能性。如果每一個立法者都希望保護其區域輸出的商品，卻希望其他商品能夠自由貿易，而且如果其他所有人放棄接受任何保護，並且接受說服願意投票支持所有商品的自由貿易，那麼我們可以將「完全」自由貿易法案，視為一種合作性解決方案，用以解決法案支持者之間所發生的「多人賽局」(n-person game)。甚至涵蓋單一商品的保護主義修正法案，會藉由「因為支持『完全』法案，所以進一步引發缺陷」的方式，來影響聯合的穩定性。這個過程會終結在獲勝聯合內的分裂(disintegration)中。相反地，如果保護行為在行政上獲得允許，那麼對進口競爭產業(這些產業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

而且這些政治人物會忽略任何既得選票的一些「小型」利益團體。接著，這些政治人物能夠為「公共利益」的立場進行投票支持，諸如貿易政策，這是隱而未明的，但是如果大型區域與小型區域同樣具有競爭性，再加上兩者在「獲勝聯合(winning coalition)的規模降低為最小獲勝聯合(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上都具有壓力，那麼我們就很難看出大型區域的代表是如何比小型區域的代表，更能不受拘束地忽略利益團體的要求，並且認為「該『小型』利益是獲勝聯合的一部份，而獲勝聯合只是一種最小獲勝聯合」。因為「為何大型區域在系統上可能比小型區域更不具競爭性(的確，小型區域似乎可能比大型區域更不具競爭性)」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明顯，所以疑團依舊未解。

在此提出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利益團體越少，他們越能夠輕易地彼此共謀，藉以呈現出槍口一致朝向政治人物的態勢(當然在極限狀態時，利益團體數量為一，且不存有共謀的問題)。在一個擁有許多利益團體的區域中，政治人物能夠影響哪一個利益團體要與哪一個聯盟結合，特別是當政治人物能夠控制議題時。如果變遷中的環境迫使利益團體放棄其對先前有利政策的支持，我們可以想像他們會重新安排他們所支持的聯合，並且試圖在先前的反對者與中立派中尋求新的支持基礎。在這種情境下，相對上較大的利益團體在「和小型利益團體相比，大型利益團體對獲勝聯合更為重要」這樣的意義上，更擁有優勢。

雖然這裡解釋了在一個較大的區域中，為何某些成員會較為「孤立」，但卻無法解釋為何成員會利用其孤立地位來支持自由貿易。

> 希望獲得保護而言，立法聯盟也就不是必須的，也就容易避免不斷地形成保護主義立法聯盟。自動出口限額措施漸漸流行，部份也是基於這邏輯。

因為在日本政治系統開始運作之前，還有一段路要走，所以日本政治系統的變遷也就難以評估。然而，政黨體系的重新建構顯然抑制了保護主義，使得聯合能維持其執政地位，而政黨體系的重新建構使執政黨(或執政的政黨聯盟)不納入重要保護主義，並且採用一組更為「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成為可能。廢止結合複數選區單計非讓渡投票制(multimember district and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s)的選舉制度改革，減低了「執政黨的派系在分配有利於一小部份的既定選區的政策上相互競爭」的趨勢(Cox and Rosenbluth, 1993)，因此這使得日本國會(Diet)的成員較少回應當地對保護的需求，較常回應國家層級的政策關切；如果選舉活動的財政具有高度中央集權的特性，那麼這種狀況特別可能發生。

在「協商出貿易協議」的面向上所發生的改變，會扭轉所有先進國家中，國內政治在貿易措施上的分裂結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與烏拉圭回合談判初次將外資法規與貿易規範綁在一起。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例，這樣的組合為美國貿易的分裂結構帶來了顯著的扭轉。到目前為止，貿易立法一般模式的目的已變成「相同產業中的勞方與資方進行遊說，以成為支持或反對既定貿易法案的團隊」，但是支持或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模式，卻展現了比先前所觀察存在於要素之間更為截然的分裂(Commins, 1993)。這是由於下面兩種情境所致：(1)在因自由化而獲利的部門中，組織化勞工的弱點；(2)對那些因為貿易自由化而失去優勢的公司老闆而言，轉而投向墨西哥的可能性。後者引起了公司所有者(所有者可以重新安排其商業)與前述勞工(必須面臨重新分配所需支付的高昂成本)之間在利益上的歧異。

最後，早期各國企圖協商移除貿易壁壘，此舉的成敗影響了

主動追求未來貿易變遷的利益組合。如果一個進口競爭產業受到保護，足以使其報酬率超出市場報酬率，那麼就會吸引新的成員，而能夠從事政治行動的產業資源將會獲得擴張。這暗示了貿易政策的變遷傾向於自我強化，就如同機構的資產組合一樣，均為貿易政策變遷所推導出政治活動變遷的結果，而這些政治活動變遷的目的在於增強那些資產組合的報酬(Cassing and Hillman, 1986)。

肆、結論與警戒的觀點

很顯然地，貿易更為開放所產生的效果是多層次的。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一般認為更為開放將有利於資本的擁有者與專業技能的勞工，同時不利於那些擁有較少技術或非專業技能的勞工。然而，非專業技能的勞工薪資產生全球性收斂的速度，不可能比在美國與歐盟中歷史上所發生的收斂來得更快。

如果在第二節中的分析是正確的，那麼我們認為當貿易開放與外資產生連結時，貿易開放才會是最有用的。貿易開放確實藉這樣的投資邏輯而使以下的生產關係成為可能：公司能夠分門別類處理生產過程，並且將組件分配到最適合每個生產階段的地區性市場。開放對先進經濟體的勞工所產生最顯著的影響，可能是那些受到外資中介的影響，而不是與財貨價格變遷(此變遷是沿著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而發生)有關的影響。雖然到目前為止，歐洲與日本的資本比美國更具有「國家的性質」，但是在這些國家中，工資的收斂暗示了從此之後，人們感受到在所有效果中，高工資對於「迫使這些國家的公司實現全球生產策略」的影響最為強大。持續的全球貿易開放、再加上低度開發世界中政治的穩定與新經濟政策，均使這項策略似乎在不久的將來會變得可行。

雖然第三小節說明了在已開發國家的政策回應中，存在著一

些重要的共通性，但是這些回應顯然經常涉及差異性(這種區別通常以貿易區域的形式存在)以及保護措施維持或增加。並沒有一個案例能夠提供純粹且簡單的結果模式：雖然開放成本極高，但依舊能獲利；雖然開放造成了箝制，但也提供了機會。整體政策回應為持續的開放背書，但是純粹自由貿易的擁護者仍然發現了許多的差異性與保護措施，並且大加撻伐：其中有一些人並不是對過往時代的殘留遺跡感到不滿，而是對現代的政策發展頗有微詞(如一九八〇年代盛行的自動出口限額)。

我們最好記住：雖然現在貿易相當開放(就進出口佔國家收入的比例來看)，但是世界經濟在所有面向上，仍然不如一九一四年之前即已存在的世界經濟一樣開放。特別的是，在現行經濟體中，勞工運動與長期資本和八十年前相比變得更不重要。回顧「一九一四年之前時期的開放的確遭到了逆轉」，以及「貿易開放耗費了六十年的時間，才回復到一次大戰之前的程度」這兩點，是很明智的。勞力與長期資本流動的開放並未完全恢復。

這項意涵是很重要的。首先，就如同現行系統一樣的開放，如果資本與勞力的流動可以取得協調，那麼系統實質上就能**更為**開放；第二，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已經達成的開放是不可逆轉的」。在過去兩年來，歐洲貨幣整合的發展豐富的詮釋了忽略後者觀點所可能產生的危險。企圖將貨幣整合(monetary integration)解釋為單向過程(one-way process)的理論，將焦點集中在利益與優勢的長期變遷，而這種理論無法陳述過去二十年來的政策扭轉。

另一個警戒的觀點關注於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將**許多事務或許多變遷**歸因於開放或「相互依賴」(Garret and Lange, 1991，該書簡要地回顧了這類的文獻)。在此，問題即在於「從一九七三年開始，這段時期除了是一段漸趨開放的時期之外，也是成長漸趨緩慢的時期」，以及在於「低成長率驅動了許多可歸因於『相互依賴』的政策變遷」：低成長會導致失業增加或工資下降；因為收入降低以及一些與失業相關的支出確實增加，導致產生財政緊

縮；產生增加投資率的公共政策，而這有一部份是藉由改善資本報酬率進行。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期中，世界經濟呈現穩定開放的狀態，但是所有蓋瑞與蘭吉所提及用以討論「相互依賴對社會民主而言是有問題的」此種狀態的文獻，卻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才開始撰寫。正如本書其他作者所言，歐洲的社會民主政黨長期以來鼓吹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歐洲本身並非一個對這些政黨形成威脅的開放商品市場，而是這些開放商品市場的結合，這些財貨市場的成長緩慢，且國際資本的流動也正在增加。

第一節所討論的漸趨開放，其所產生的經濟衝擊會造成各種政府與私人利益的回應。除了直接拒絕進一步開放，甚或改變現行的開放層次外，還存在著採取「在保存獲益的同時，也調和因為開放所帶來的一些負面效果」這種做法的可能性。政府主動進行政策協調，能夠避免政府在總體經濟政策中自由調度所受到的一些限制。出口獨立的經濟體越多，該經濟體也就越依賴外國市場需求的成長。因此，某個政府在其他政府的經濟決策中，也是存在著相當重要的利害關係。政黨與工會在使其活動國際化，並且與外國夥伴協調其行為的過程中，共同獲得了利益。很明顯地，在此面向上的發展正處於初始狀態，但是同樣很明顯的是，只要能維持這個開放系統，那麼「開始進行國際性合作」的動機至少就能持續存在。

在已開發國家中，非專業技能勞工的經濟財富普遍減少，這是相當類似的狀況。因為「近來貿易系統的變遷能夠很輕易且快速的扭轉」這種狀況的可能性極低，所以對這些人而言，標準的「福利」措施(貿易保護措施)在政治上相當不具可行性。反過來說，在這些國家能夠計算經濟成長所產生的普遍外溢效果(或「下滴」(trickle-down)效果：這種效果能夠將一些利益傳送給那些非專業技能的勞工)之前，正在進行的經濟重新建構所產生的效果，可能會陷入下面的困難中：透過經濟成長，我們要讓某個部份的人口獲得哪一種利益。既有一些社會為了要扭轉團體財富減少的狀

況，因而必須採納各種非貿易的相關政策措施，也有另外一些社會將持續經歷存在於「因全球生產系統的出現而獲利的那些人」，與「並未獲利的那些人」之間不停擴大的分裂。

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七三年這段期間，國家民族的政治演進是一則很少考慮那些超出國家疆界的事件而發生的事情。就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末期的歷史而言，即使在這段時期所出現的社會科學文獻，仍然對學者如何思索社會過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在這段時間所出現國家主義的插曲，卻堅決抵抗這種異常現象。顯然，我們不再能將國家理解為一個封閉的系統。這一點也是清楚的——即使在早先的時代中，將國家視為一個封閉系統基本上是會讓人誤解的。

✱網路試閱版聲明✱

1.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本試閱版僅提供尚未上市的校稿版本，目的是為了方便讀者先睹為快。所以，此試閱版本不論是內容或排版，都與最後上市的版本，仍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Email：weber98@ms45.hinet.net)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正式送印之前能做修正。
3.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